

汉字在古代碑石上的显现

陈虹

摘要: 碑刻是古代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是各个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标记。汉碑隶书的劲健苍浑,北魏石刻的浑厚峻伟,唐碑铭文的雄健华丽,带给人们丰富的审美感受和深沉的文化哲思。古代碑文石刻中蕴含着先贤圣哲对生命意义与价值问题的深沉思考和不息追求:如何来超越生死?如何而走向“不朽”?汉字显现于历代碑石之上,犹如岿然不动的民族文化之根,永远给予人们以民族精神的指引。

关键词: 碑刻; 汉字; 审美形态; 生命意义

作者简介: 陈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读图时代汉字的审美价值研究”(SK2016SD59)。

中图分类号: B83-05; J2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3.015

自人类在摩崖巨石上留下第一道划痕,就镌刻下对坚石的信赖和超越时空的渴望。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都曾留下铭刻文字的历史,如苏美尔人的钉头字泥版、钉头字太阳神碑,古埃及的记功碑、墓室文字,玛雅人的96字碑……然而,随着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戛然而止,这些文字也最终消亡,镌刻着这些文字的碑石器物仅成为考古学家们苦思冥想的研究对象。然而,汉字却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与碑石结缘,完整而精博地展示了其演变的历程,显现出多样的美学形态。“以尺壁摄万有,以刀石解世界,理尽赋诗乐志之秒有,情发千古幽思之胜慨。”^[1]成为历代中国人永久记忆之所寄,永恒情感之所托。

—

“碑”的概念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碑”包括碑刻、墓志、造像题记、摩崖文字等所有的石刻文字;狭义的“碑”仅指东汉以来形成的,由碑首、碑身、碑趺组成的,具有形制制度的石刻上的文字,包括祠庙碑、德政碑、墓碑等种类。本文囿于篇幅,仅对狭义的“碑”刻文字的审美形态与美学意蕴略作探讨。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碑,竖石也。”认为“碑”是扁平而狭长的石头。对“碑”最早记载的典籍文献是《礼记》。《仪礼·聘礼》中云:“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2]《礼记·祭义》中有载:“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3]郑玄作

注曰：“共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4]说明早期的碑用途有三种：“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5]这与后世“碑”的用途显然相去甚远。

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这样解释“碑”：“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6]显然，此时的“碑”已有了较明确的精神上的意义。蔡邕在《铭论》中曾这样阐述汉碑与先秦钟鼎的联系：“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7]可见，在蔡邕看来，碑刻有着替代钟鼎礼器的功能。而另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汉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经典《六经》指定为读书人的必读书目。汉灵帝于熹平四年（175）昭命蔡邕写定儒家“六经”作为范本，派匠人刻在石板上，立于太学门外，让天下读书人都来校勘取证。这种以石经为典范来规范文字的做法也自此流传后世，广被效仿。

曹魏西晋时期，为杜绝厚葬虚夸之风，实行薄葬禁碑政策，厚葬与私家立碑的风气得到遏制，碑刻的数量大为减少。东晋年间，禁碑法令渐渐松弛，立碑之风重新盛行。而在同时代的北朝五胡之地，佛教的传入以及帝王的热衷，使开窟造像之风日盛，以造像碑题记为代表的书法石刻应运而生。再加上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所以立碑之风极为盛行，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刚健朴素的文化风气，由此产生了自由多样且独具风貌的碑刻书法艺术。在南朝，帝王和世宗大族厚葬之风盛行，豪门显贵的陵墓祠庙中一般有碑、阙、墓志、神柱等，也都雕刻文字，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碑刻艺术的发展。南朝的雕刻书法主要继承东晋“二王”清秀俊逸的风格，雕刻精致洗练，更多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随之而来的隋代虽然只统治了短短的37年，但是作为一个南北统一的朝代，其碑刻艺术融南北风格于一炉，在碑刻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对唐代的碑刻产生直接的影响。

唐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碑刻艺术进入到全盛期。据《全唐文》和《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记载，当时的碑志、塔铭、造像记等大约有三千多种^[8]。此时的碑文多由文章名家和书法名家撰书，李世民不仅亲手书写《圣教序》，多次刻石立碑，还常令当时的书法家们与高官显爵们撰书碑文，如虞世南奉敕撰写并书《孔子庙堂碑》，魏征奉敕撰、欧阳询奉书《九成宫醴泉铭》等，因而形成了唐代书法艺术空前鼎盛的局面，涌现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一大批著名书法家。朝廷还设有专门负责为帝王祠宗营建选石的制碑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唐代的书碑名家和碑刻高手的数量成为历史之冠，碑刻文字诸体兼备，精妙的书法也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豪华壮丽的唐碑之中承载着的是太平盛世的风采。

宋代兴起了倡帖轻碑之风，在碑刻上基本承续隋唐余风，但失去了唐碑的精致生动。大多碑刻只题写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如“福”“寿”“龙”“虎”等。而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金朝留下的碑刻相对较多之外，辽与西夏碑刻数量都比较少。元明时期碑刻也不复繁荣。一直到清朝乾嘉年间，考证之风兴起，碑刻复盛，特别是1764年清代经学家阮元在《南北书法派论》

《北碑南帖论》中详举了正史、金石书中所载的传记、碑刻来证明北朝书法传承有绪,从而使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看重的两汉刻石、魏碑、六朝墓志等的价值重新被发现。碑刻文字反过来对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书法家有意去突破精巧妍美的帖学书风,追求一种金石之气、古拙之美。于是,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名家和书文俱佳的名碑,记载下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着当时的世态人情,充分发挥碑刻文字的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功能。

如今已进入21世纪的信息社会,信息记录和传播的载体日新月异,然而在中国,立碑刻字依然是人们纪念先辈、铭记历史、寄托情思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碑刻的生命力实际上正来自于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强大生机。在对中国古代碑刻文字的审美观照之中,人们可以穿越历史,体悟古人幽邃的精神时空。



二

受内容、字体、书家、刻工、书写材料以及种种因素的影响,碑刻的文字形态往往一碑一奇,各领风范,但同时也具有所处时代字符群所共有的宏观审美风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秦汉、魏六朝以来,“非文人化的碑刻书法在它一开始,便在时代气候的影响下,带上了中国古代社会整体文化的浓厚气息,不期然而然,也已经开始蕴含着较为成熟的审美意识”^{[1]133}。汉碑、魏碑与唐碑是中国碑刻文化的三座高峰,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汉字在书体演变最关键阶段的审美特征,下文就对这三个时期碑刻文字的审美形态作较详细考察。

(一) 苍劲浑朴的汉碑

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变、由古文字向金文字蜕变的关键时期,这时的碑刻文字,形态多样,篆隶并存。由于两汉时期特有的美学理想以及碑刻文字的特殊性,其文字形态体现出独有的审美风貌:既有小篆的凝整典雅又有简隶的方拙朴茂,既具篆书的奇古浑朴又具八分书的工整华丽。

两汉的碑刻文字就兼有篆书的孑遗与隶书的特征。汉代的篆书碑刻大多继承了秦小篆的风格,但是不同于秦篆匀净圆转的线条,汉篆笔画中开始出现方笔,形成了方折的隶意,笔画圆瘦,结构匀称平整,如西汉的《东安汉里刻石》《汉郁平大尹墓铭》以及东汉的《袁安碑》等。西汉的碑刻较为少见,篆书刻字更是稀少,大多是几个字的题刻,如《霍去病墓刻石》仅有“左司空”三字篆书,且变化随意草率,不如秦篆的严整划一。到了东汉,虽然隶书此时已成为通行字体,但是由于树碑立传、刻石纪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扬名、流芳千古,书者态度是恭谨的,刻工用刀是慎重的,篆书的典雅庄重更能迎合立碑者的审美心理。因而在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也常以篆书来刻写碑文,又因篆书刻写速度较慢的缘故,便常采取以篆书题写碑额、而以隶书刻写碑文的方式。碑额文字居于石碑的上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以篆书题写碑额,一方面体现了庄重肃穆的要求,另一方面篆书线条的装饰性也有利于书者与刻者个性的发挥,体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形态。有的笔画雄健粗壮,以隶书笔意表现篆书字形,如东汉《白石神君碑》碑额“白石神君碑”五字;有的方折劲挺中夹杂圆曲的篆法,显得刚劲而又委婉,如东汉《张骞

碑》；有的结体茂密，有的笔画疏朗，有的用笔遒劲，有的圆转巧丽。有的刻字干脆结合了篆书和隶书笔画，似篆非篆，似隶非隶。如西汉《群臣上麟刻石》中的“臣”字写作，已接近隶书；《庶孝禹刻石》中的“孝”字，写作，上部封闭性结构有篆书的特征。这本是汉字隶变过渡期间特有的现象，但是即使在隶书完全成熟的东汉后期，依然还有这种字体的存在，显然是书者或刻者为了字体达到庄重典雅的审美效果而有意对成熟隶书作的艺术化处理。

东汉后期还普遍以八分书用于碑刻。八分书是一种带有波挑的标准隶书，其用笔逆入平出、横向伸展、左右开张，波挑分明，转折形方而笔圆，结体工稳扁方，显得典雅凝整、整饬华美，可以充分体现庙堂庄严和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情趣。如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如图1）就是东汉隶书成熟期的作品。碑上的文字端严而秀逸，方整又秀丽。其结体以横向取势，笔画粗细分明，横画波磔突出，平正中又使人感到有翩翩欲飞之势；其刀锋犀利清新，使笔画显得细劲刚健，瘦硬似铁，显出一种骨力与雄奇；而结体的舒展，波磔撇捺的加粗又体现出一种韵律和无尽的意蕴。章法布局严谨规整，列距较细，行距疏朗，字形笔画交相呼应，显得飞动而和谐。细品碑文，和谐中透露出一种活泼的生命气息，让人似乎能感受到书刻者那刚健的精神和张扬的个性。再如被称为汉隶“最后之花”的《曹全碑》（如图2），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碑文隶书结体工稳舒展，主横画和撇捺的波挑都特别加长，笔画细秀流畅，显得秀美飘逸。整个碑文章法纵横有序，既秀丽华美，又轻盈飘逸，让人似乎能感受到书刻者那细腻绵长的情感。



图1 《礼器碑》



图2 《曹全碑》

汉碑石刻风格繁多，就其分类历史上名家学者各有所论。朱彝尊（1627—1709）在《西岳华山庙题跋》中将汉隶分为三种：方整、流丽、奇古；王澐（1668—1734）在《虚舟题跋》里的《礼器碑》中将汉碑分为三类：雄古、浑劲、方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中则将汉碑分为八类：骏爽、疏宕、高深、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类似的分类还有很多。当代学者侯镜昶在《书学论集·东汉分书流派评述》中则更为详尽地列出有14种不同风格的碑刻：方正派、方峻派、纤劲派、华美派、奇丽派、平展派、秀劲派、骀荡派、宽博派、馆阁派、劲直派、摩崖派、雄放派、恬逸派。可见汉代碑刻在庄重工整的总体风格之下，又有着异彩纷呈的表现形态，这既是汉字发展演变过渡期的必然状态，也反映出汉代恢宏大气的政治环境，以及由之

带来的宽博开明、敢于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

(二) 浑厚峻伟的魏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从隶书演变为楷书的重要阶段。魏晋时期,隶书尚是官方通行书体,石刻文字也大多显为隶体。魏著名的石刻《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羨碑》等均为隶书,笔画方棱,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体现了端严的庙堂色彩;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好大王碑》(如图3)、《司马芳残碑》,书体皆兼有隶书和楷书的特点,笔画多为方笔,字形方正。而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则大多以楷书刻写。南朝出现了如宋《爨龙颜碑》这样的名碑,其碑楷书中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具飞动之势,显现出雄劲峻美、静穆典雅、疏放妍妙的风格,与北朝碑刻的雄劲似同而实异”^[8]。

位于北方地区的北朝,碑刻书法比南朝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北方历来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虽然西晋被灭后,士族大户大多南迁,但是仍留下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西入的佛教文化互相影响和渗透,形成了北朝刚健而清新的地域文化,也孕育出一种新的书体——魏体。这种书体以方笔为主,隶意浓重,结体大胆夸张,充满自由想象力,从而开创了“魏碑”碑体的一代风貌。

魏碑的字体形态多样,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期,由于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各地的刻工们可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审美情趣来处理字的形体结构:有的方直端正,简洁大方;有的以隶书为主,但是笔画撇捺被夸张处理;还有的在隶书中间有楷意,等等。到了后期,楷体更加明显,形体趋于规范,横画倾斜健劲,点、撇、捺跌宕起伏、峻厚奇逸,结笔爽利,整个字显得厚重拙朴,雄健大气,体现出北朝刚健豪爽的民族性格。北魏正光三年(522)刻立于山东曲阜的《张猛龙碑》(如图4)是北朝魏碑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其碑额12字,碑的正面用阳文书刻26行,每行46个字,碑阴刻立碑者姓名。碑文记述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办校的事迹。碑上的文字已是成熟的方笔楷体,字的结构紧密,横笔微微上斜,方起方收,显得骏爽有力;转折处方正锐利,但又于体势强劲之中呈现出宽裕开张之感。此碑刻工精巧,笔画的起落刻得方整凌厉,更增强了体势的力度。其布局井然有序而又相互呼应,因而在端稳之中却也渗透出几分空灵雅致。康有为先生在《广艺舟双辑》中曾对魏碑书法高度评价,称其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9]826}



图3 《好大王碑》



图4 《张猛龙碑》

北朝的石刻追求规整实用，不管是碑刻墓志还是造像记、摩崖，刻字的排列经过精心设计，甚至将文字刻凿在整齐的界格中，整个版面显得规整凝重，秩序井然，显现出北方文化质朴理性的特点。而中晚期南朝优美秀丽的书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北朝书风，最终形成了风格纷繁而趋于接近的趋势。康有为先生说：“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往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9]807}或许正因如此，魏碑文字以其丰富的运笔内涵以及自由的气度而被清代学者关注并推崇。

总之，魏碑文字沉稳、厚重、浑实、健劲，在经过了千百年的风摧雨蚀之后，笔画刀痕变得更加苍润古拙，于是最终呈现给人们的是它那浑坚大气的气魄，浑厚沉毅的意态以及雄强刚健的精神。

（三）雄健华丽的唐碑

唐碑石刻是中国碑刻发展鼎盛阶段的体现。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以及章法的布局都接近尽善尽美。篆、隶、楷书均已发展完备，刻石技法也大大提高，可以根据字体和书体的不同运用相应的刀技，还能根据墨书的轻重缓急、提按顿挫，采用不同的刀法，表现碑文起伏变化的韵律。有的墓碑文字的笔画撇捺趋向明确，挥笔泼墨之态势得到立体的再现，刻刀不仅增强了笔力的刚健舒展，还大大加强了笔书所难及的厚重和丰满；还有的碑刻似乎能让人们想象出刻工挥凿奏刀时情感的起伏与动作的节奏，表现了丰富的意趣与美感。

唐时碑刻种类不断增加，碑刻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有墓陵类碑、纪功记事碑，还有佛道寺庙碑、祠庙家庙碑、学府文庙碑、传承纪念碑等。碑刻也具有了更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唐朝打破了文人、士大夫不参与书写碑文的习惯，帝王将相、书法大家都参与了书丹碑文。因此，唐代碑刻既有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古雅秀丽，也有李邕、柳公权为代表的劲健爽利，还有颜真卿的方严整肃、大气磅礴。这是盛唐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也是海纳百川般的时代文化的孕育。盛唐的书风流派百花齐放、竞相争雄，“不仅突破了秀雅妍丽的风格，而且在唐初峻整、健劲、妍媚的楷书风格上又发展了一步，形成刚健雄强的气魄和张扬豪放的艺术风格”^{[10]97}，而碑刻书法则以凝固的形式永远地保存了这种盛唐气度。下面笔者拟通过几方优秀的唐碑来作较具体的直观赏鉴。

《孔子庙堂碑》（如图5），建于唐贞观二年（633），是为了纪念孔庙落成而建，由著名书家虞世南撰文并书写。碑文以楷书书写，结体端正秀丽，用笔轻柔、方圆兼备，柔中有刚，温柔洒脱中流溢着儒雅之风，刻工精细，刀法巧妙，笔画起落处多用圆刀，轻挑笔画处逆入回刻、精细工巧，原作的的神韵盈碑，呼之欲出。

《晋祠铭碑》（如图6），立于唐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晚年所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块行书碑。该碑书写得成熟老练，颇有帝王睥睨天下的气韵。其笔画遒劲有力，字体洒脱放达，笔势流逸潇洒。碑石质地较粗，但是增加了笔力的浑厚圆劲，形成了柔中有刚的效果。风化剥蚀的痕迹增加了碑文苍茫浑厚的美感，显得雄厚浑成，充满帝王之象。

《断千字文》（如图7），具体时间不明，大约立于唐武德元年—天佑四年（618—907），相传为张旭所书，被刊刻在六块长方形的石头之上，是唐代草书碑刻的杰出代表。该碑文是狂草体，

笔画纵横豪放、粗细相间、勾连绵延，字体大小不一、错落而下，其激越似闪电、狂放如野火的激情顺着笔势一泻千里。当然，这幅碑刻的工艺不够精巧，宛转轻柔的笔画韵律没有很好地表现，显得有些僵硬死板，因为草书的雕刻要求刻工不仅有精熟的刀技还要有较高的书法造诣。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书者桀骜不驯的风骨和豪放热烈的情感，这是张旭鲜明个性和卓越才华的表现，也是大唐气势的张扬。

《颜勤礼碑》(如图8)，唐大历十四年(779)刻，是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立，并亲自撰文书写。此时颜真卿的艺术风格已臻成熟，笔法更加圆润雄浑，结体宽博端稳，骨力遒劲、气宇轩昂。《颜勤礼碑》的碑刻文字笔力苍劲，结体雍容端庄、舒展开阔，空间格局紧密而浑满壮实，整体给人气势磅礴之感。这尊碑石的雕刻技艺也是甚为精妙，在起笔和收笔处以及竖钩、点、撇捺处都采用圆刀旋刻与方刀回刻的技法，较好地再现了原书的裹锋写法和笔韵，并且增强了笔画的张力，加强了颜书圆润浑厚、沉雄伟壮的美感。压刀慢进的刻法使碑文线条酣畅有力、气韵贯通，洋溢着伟壮沉雄的气势。由于长期深埋地下，经过长时间的风化水蚀，这块碑的碑面已经有了斑驳坑洼，字的刀痕也有剥蚀，似乎使碑面不再那么完美，但是却增添了几分坚润雄浑，更使人感受到古韵悠远、忠义沉雄的气象。《颜勤礼碑》的书法是大唐帝国繁华气度的体现，也是颜真卿道德品性、情感心声的自然流露。当然，它在石碑上的完美表现是又一次成功的再创作，“是那位雕刻艺术家情感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领悟与刀技的天然默契，是情艺交融、智功合糅的艺术创造”^{[10][24]}。面对这样的碑刻文字，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由衷的敬意。正如朱光潜先生说：“我在看颜鲁公的字时，仿佛对着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觉地耸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紧张起来，模仿它的严肃。”^[11]这句话传神地表达出千百年来观者的共同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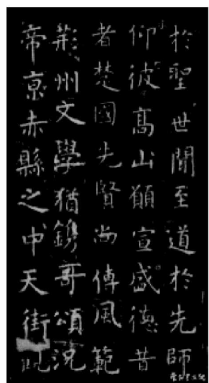


图5 《孔子庙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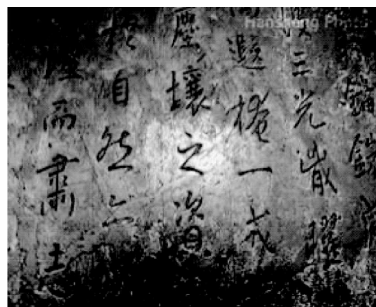


图6 《晋祠铭碑》



图7 《断千字文》



图8 《颜勤礼碑》

这四尊碑刻只是唐三百多年间刻制的丰碑伟碣中的吉光片羽，人们便可从中初步领略那个时代前所未有的恢宏气象和书刻家自信而豪迈的内心世界。由此可知，碑刻是各个时代的精神标记。庄重古朴的汉碑反映着汉王朝的风采，峻整方正的魏碑是北方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唐碑则被盛世气度所笼罩……面对石碑，线条模糊、漫漶、斑驳、字迹不清的碑刻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审美感受和深沉的文化哲思。

三

从形态不一、文字简率的“石”到有着一定制和精美书法的“碑”，期间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在早期的多种文化载体如兽骨、陶器、青铜、简帛等都逐渐消失之后，唯有“碑”还沿用至今，这与其表里如一的“物象性”特征有关。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石头具有坚固、顽强、灵秀、永恒的特性，能承载着人们对坚贞、不朽的向往和想象，因而古人总将最重要的内容刻于磐石。商周铭功于钟鼎，汉代纪德于石碑。蔡邕曾说：“钦盛德之休明，懿钟鼎之硕义，乃树碑镌石，垂世宠光。”^[12]刘勰也曾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13]由之可见，述德、铭功、纪事、纂言是碑刻与生俱来的使命。人们将最值得记载的事功和言词铭记于碑刻，碑刻因而成为古代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碑刻文字中必彰显出独特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蕴含在一篇篇碑志铭文之中，体现在一个个方块字的书法之中。因此无论汉碑隶书的劲健苍浑还是唐刻楷书的雄健端庄，都不仅仅是一种书法风格，而是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外化，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直面青黑色的石碑上端雅肃穆的汉字，感受到的是古人对生命意义与生命价值等问题的深沉思考和郑重表达。

（一）对生死的超越

生死是人生中最为重大的时刻，也是一切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最为深刻的主题，畏惧死亡、留恋生命是人类乃至一切生物的本能。超越生死、追求永恒是自古以来人们最大的愿望。墓碑是碑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最能让人们切近死亡的物象。人们面对墓碑时伴随着一种非常近、非常远的情绪，这种特殊的情绪就是由生死大事而产生的敬畏之心，而隐匿在敬畏背后的真正意愿是对生死的超越。人是在时间与空间中与这个世界照面，时间的限度规定了生死的必然。那么如何去超越永恒的生死呢？这是人类有自我意识以来最关注的主题。碑刻似乎是让逝者走向永恒的一条通道。碑主人的生命尽管已然逝去，而其人其事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却永远地保存在文化长河之中。因此，沉重的石碑中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内涵，它浓缩了一个生命的一生，并在后人的一次次造访中使得生命之光得以重现。碑主生前的功绩懿德由此超越了时间的局限，通过碑刻成为精神走向无限。

碑的形制中也似乎体现了人们这样的愿望。起初，汉碑一般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碑趺）三部分。长方形的碑身，上有螭首，下有龟座。所谓“螭”是指一种黄色的龙，是一种象征吉祥、英雄的神物，相传具有行云布雨的超凡神力和祛灾降福的无比灵性，因而成为华夏的图腾，成为中华精神的象征物。一般在碑首精雕着龙纹象征着皇权或地位的尊崇。而龟趺的“龟”，正

名叫“赑屃”亦称“霸下”，传说力气极大、善于负重而又寿命很长，以它作碑座也是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使碑石保存久远。站在这样的碑前审视碑文，碑自身的表象特征会一并调动人们的感受、知觉、想象、情感等各种审美心理，让人们在观赏碑的伟岸与其装饰文字的沧桑的同时，油然而产生一种历史的崇高感。这种感受显然迥异于翻阅墨迹史书。

(二) 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所谓“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14]。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实现生命价值是生命中最高的追求，生死价值则是生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共性上说，人的生死价值都是在终极关怀的观照下确立的，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追求不朽，差异只在于走向不朽的途径”^[15]。古往今来，无数圣哲大贤希望能寻找到一条走向不朽和永恒的通道。道家希望通过回归自然的方式来保持肉身长久以达到不朽，佛家将超越无执进入涅槃境界作为对人类终极的关怀，而儒家则是把从现实人生中建功立业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超越生死走向不朽。

作为承载着丰厚传统文化的“器”，碑刻中附着的最深刻的、最光辉的事物，便是这种体现着生命价值的“道”，它巧妙地将“道”“器”融为一体，以“器”载“道”。这里有道家的“齐一生死”之道，也有佛家的“超越无执”之道，但更多的是儒家的“人生修为，造福苍生”之道。儒家思想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生的世界要有所作为，造福国家社会，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完满。生命的价值还在于对忠信礼义的坚守，甚而可以“舍生取义”。因此，那些承载着圣帝明君、功臣贤相、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以及孝子节妇等的碑刻，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精神，以此彰显生命真正的价值。正是在世世代代对生命意义的彰显和标举之中，中国人形成了伦理化的生命价值观，并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 对民族精神的垂范

“彪炳真、善、美，这是碑刻文化最核心的认知价值。让真善美的精神不灭，让真善美的灵魂永驻，是碑刻文化的理念坐标。”^[16]提倡积极的人生意义追求，垂范本民族深层的文化精神，建立起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从而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壮大——碑刻就承担着这样一种维系的使命。几千年来，华夏民族世代沉淀下来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追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的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富贵困厄不移其志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都可以在碑刻内容中得到体现。因而探寻碑刻博大深邃的精神内蕴，能激荡天地正气和民族豪情，复苏灵魂中的民族性情，让人们对个人生命价值做出终极判断，从而使精神上升到一个崇高的境界。这是现在任何高科技手段制作的文字所无法取代的。

一石一春秋，一碑一世界。碑刻不仅是一尊石器，它蕴含着人们对精神价值永不停歇的追求；碑文也不只是显现的汉字，而是同矗立的石碑一起，给予人们精神的指引。它们帮助人们从中追溯文化之根，切近无数先贤圣哲曲荡悲涩的心灵，“在这个再次面临启蒙与转型的民族心灵间，激起各类生机与绚烂涟漪”^[17]，从而保留着对传统文化最鲜明的记忆，期盼着宽厚雄强的民族精神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张啸东. 传统的再生 [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 [2] 郑玄，贾公彦. 仪礼注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53.
- [3] 郑玄，孔颖达. 礼记正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27.
- [4] 中华书局编辑部. 汉魏古注十三经 [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22.
- [5] 金其桢. 中国奇碑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2.
- [6] 刘熙. 释名疏证补 [M]. 毕沅，疏证. 王先谦，补. 北京：中华书局，2008：219.
- [7] 严可均. 全后汉文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1.
- [8] 王鹏江. 唐碑研究 [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 [9] 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 历代书法论文选 [C].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 [10] 李芝岗. 中国雕刻书法艺术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 [11]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24.
- [12] 邓安生. 蔡邕集编年校注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9.
- [13]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14.
- [14] 李德顺. 价值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3.
- [15] 徐春林.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49-53.
- [16] 李慧，王晓勇.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 [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Chen Hong

Abstract: Inscriptions are the essence and concentration of ancient culture, and are signs of the time spirit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of Lishu style of calligraphy in the Han Dynasty are magnificent and powerful. The stone carvi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s vigorous and grand. The inscriptions of tablets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strong and gorgeous. All of them bring us abundant aesthetic feelings and deep cultural meditation. The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contain the deep meditation and the constant pursuit of meanings and values of life by the renowned sages: How to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How to achieve the "immortal"?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ing on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in all previous dynasties, like immovable cultural roots, always give people the guide of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inscriptions; Chinese characters; aesthetic form; meanings of life

（收稿日期：2017-03-11；责任编辑：陈鸿）